



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武汉大学校史前段管窥

冯天瑜

摘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世纪末叶所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总师范等,为1913年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源头,而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又为1928年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直接源头,因此武汉大学校史前段追溯至19世纪末叶确证无误。自强学堂已开始具备近代高校性质,而方言学堂则为自强学堂变名,并于1913年重办,定名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关键词: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汉大学

一些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如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大学等,都有一个于数百年或百余年间,从简陋的文教设施,历经转型(有些还出现中断)发展为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大学的过程。校龄从1636年(美国独立前百余年)算起的哈佛大学,1638年招收第一届4名学生(教师仅1人,唯一课程是神学),同年,牧师哈佛病逝,捐出部分遗产和400册图书,1839年马萨诸塞州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将该校命名哈佛学院,此即哈佛大学前身。武汉大学的历史也略如此类,然起始点高于1638年的哈佛。

晚清的近代性教育,与发端19世纪60年代初的洋务运动同步,而洋务运动初兴于京、津、沪、闽、粤,故近代教育起始于这一带,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广方言馆(1864)、福州船政学堂(1867)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学堂。湖北是洋务运动后期中心地,其近代教育于张之洞督鄂时期(1889—1907)崛起,有急起直追之势。张之洞19世纪末叶在湖广会城武昌兴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总师范等,乃“湖北新政”果实,也是清廷认定的“京外高等学堂”较有成效者之一。1928年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直接源头为1913年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而武昌高师又与上述近代性教育设施存在渊源关系。

一、张之洞: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清末制订新学制,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奏请添派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入京会商学务,张百熙在奏折中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①。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修纂《奏定学堂章程》,规范从小学到大学及通儒院(相当研究生院)的三段六级制,此乃中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时称“癸卯学制”。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

奏请为之设祠,称张氏“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备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①。张之洞是晚清朝野公认的重视教育、通晓教育,并为文教近代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张之洞的教育活动是全国性的,而湖北为其主要展开区域。张氏光绪十五年(1889)调补湖广总督,自此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晋京入参军机、任体仁阁大学士,其间除二次暂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制学堂章程外,十余年一直督鄂,其教育兴革略分三阶段:

(一)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为“书院时期”,针对当时空疏老迈学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并初兴学堂。

(二)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897—1900)为“书院改制时期”,在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又进一步建立专科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经改制的两湖书院“名虽书院,实则与学堂无异。”^②

(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为“新学制时期”。张之洞二次署理两江总督(1894年11月—1896年2月,1902年11月—12月),兴办新式学堂有成(著名者为三江师范学堂,后更名两江师范,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前身)。张之洞返任湖广,于1902年成立“湖北全省学务处”(1906年改称“学务公所”),在湖北广设新学堂。

张氏还大量派遣留学生出洋。湖北成为清末留学日本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张之洞督鄂间,湖北近代教育长足进展,时称“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麇集。”

以往常说,武汉大学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此言不差,因为武大的直接前身武昌高师建立于民国二年(1913年)。但置之较深广的历史背景言之,应当说武汉大学还是清末以降近代教育改革的自然延伸。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期间从硬件到软件建立了初具规模的近代教育体系,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武昌师范大学的校长张继煦(1876—1955)、教授王葆心(1867—1944)、胡钧(1869—1944)、刘成禺(1876—1952)、李廉方(1878—1959)、黄侃(1886—1935)等,武昌大学的校长石瑛(1879—1943)等,皆曾就学于张之洞创办的改制书院或新式学堂,并由张之洞选派出国留学,这些人多以张文襄门生自命。值得一提的还有张之洞、端方于1904年建立的图书局(湖北图书馆前身),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性公共图书馆,而图书局当时主要为各学堂师生服务。

张之洞堪称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湖北近代文教的奠基人。离开张氏主持之湖北新政间的文教兴革,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图书馆等底蕴深厚的湖北文教单位的历史均成无本之木。

二、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兴办

同其他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创办新式教育,为的是满足洋务事业急需,诚如《清史稿》所说:“大抵此期设学之宗旨,专注重实用。盖其动机缘于对外。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无学制系统之足言。”^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奏陈《修备储才九事》,在“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之后,强调“宜广开学堂”:

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种制造、商务、水师、陆师、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

张之洞当然懂得教育须从基础用力,但缓不济急,他首先从办洋务急需的外语(时称方言)和诸实业专科教育入手,创办一系列专门学堂,后此一步才广设中小学及幼稚园。

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专科学堂主要有列几所:湖北方言商务学堂(1891)、湖北算术学堂(1891),以上两校为自强学堂筹备期间的名称,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1892)、湖北驻东铁路学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上,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一七。

③《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6年。

堂(1896)、湖北农务学堂(1898,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1898,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等。

张之洞在设立两湖书院时,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1892年11月19日),张之洞批示铁政局设博学堂,拟名“**自强书院**”,指令“**务期明年学规整齐严肃,以期多得博通经世之才**”。此自强书院当为自强学堂之初名^①。

遵照张之洞指示,经一年准备,该教育设施于光绪十九年(1893)秋正式成立,定名“**自强学堂**”,校址在湖广会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自强学堂1902年更名“**方言学堂**”,校址迁至武昌东厂口正街(今武昌蛇山南麓,阅马厂东侧),后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皆设此处,直至1932年武昌珞珈山校舍建成,武汉大学方从武昌东厂口迁往珞珈山。

三、自强学堂略具近代高校雏形

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均未标示“大学堂”名号,然其近代高校属性有迹可考。

(一) 近代性

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1893年10月31日),张之洞向朝廷奏陈《设立自强学堂片》曰:

治术以培植人材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②

这“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便是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昭显出区别于作为“科举养成所”的旧式官学及书院的近代教育属性。

(二) 多学科性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称:

兹于湖北省城内铁路局之旁,购地鳩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

明示学堂地址、名称和学科设置,说明自强学堂并非专科学校,而是由外语(方言)、工学(格致)、数学(算学)、商学(商务)四类学科组成,略具综合性高校雏形。

《设立自强学堂片》对上述四门学科的重要性分别叙述:

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③

值得一提的是,自强学堂所设商务门,是近代中国首先设立的商科教育。

(三) 教员、总办水平较高

自强学堂教员多各科专才。清末著名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及其弟华世芳任算学门教习,时为张之洞幕僚、精通英语及英国文学的辜鸿铭(1857—1928)任方言门(英文)教习,况周颐、郑毓英、许寿仁、杨本适等教员皆为一时之选,留学归国任教自强学堂的陈毅、胡钧等也是学有专攻之士,所聘洋教习如骆丙生等来自牛津大学等欧美名校。张之洞任命洋务干员蔡锡勇(1847—1896)为总办(相当于校长)。蔡锡勇去世后,由二品顶戴候选道、“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的张斯恂任自强学堂总办,钱恂为提调,程颂万继任提调。

(四) 兼造专材、通材,“程度与高等学校略同”

自强学堂改组后,虽以教授方言为主,但仍兼课化学,并附译西书。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奏称,自强学堂“**储译材于此,储通材亦于此**”;同年秋,张之洞在函札中再次申述“**自强学堂为造就通才之根本**”,把自强学堂的培养目标定位为知晓“**各种政学**”特别是办理外务的文官。

①见《湖北方言学堂一览》之《学堂沿革表》。

②《设立自强学堂片》,载《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

③《设立自强学堂片》,载《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

1903年,清廷颁布实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有“京师译学馆、外省方言学堂毕业奖励”条,规定“五年毕业,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而所学系交涉事务,年限亦较多,考列最优者,作为举人出身”,自强学堂及后继之方言学堂,学制皆五年,且所学系交涉事务,当属“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教育单位。这是对自强学堂一方言学堂性质的认定。

清末使用的“高等学堂”一语,从日本传入,约指高中或大学预科。而在1895年设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1898年设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之先,中国尚无正规的近代大学,“高等学堂”已是当年程度较高的学校。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筹办大学堂情形豫定办法》中论及作为大学堂预备科的“高等学堂”时,特别肯定自强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为全国翘楚:

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①

综合张之洞对自强学堂的定位、《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参之以管学大臣把自强学堂列为最有成效的京外学堂之一,自强学堂无疑是清末有数的高等学府。

四、方言学堂为自强学堂变名

自强学堂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学习方言的学生须住堂肄业,其余三门学生只按月考核成绩。其后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教授,格致、商务因师资、教材缺乏,只得停课,这样,自强学堂仅存方言一门,分英、法、德、俄四个语种,每一语种以30名学生为限,五年毕业,实际成为一所类似京师同文馆的外语学校。1898年,自强学堂增设东语(即日语),自此共设英、法、德、俄、日五国外语。

1898年11月,日本海军大尉臼井兼太郎访问自强学堂和邻近的武备学堂,给“筑紫”号舰长加藤友三郎提交《武昌府自强学堂及武备学堂考察报告》,该报告虽有欠准确处(如称自强学堂系“去年”即1897年方改为学堂),但日人目击记录大体可以佐证自强学堂办学情形:

自强学堂在湖北省武昌府南端附近,很久以前是支那旧式学校(犹如日本的寺子屋),在去年改称学堂,成了纯粹的外语学校。校内所教为日英法德俄五国语言,各种语言的学校限制在三十名以内,全校学生定员为一百五十名。

现在招满学生的只有日本语科,此外英德俄各科分别有两三名。日本语的教授由我国人柳原某担任。^②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自强学堂改称湖北方言学堂,校址从武昌三佛阁迁往武昌东厂口,北倚蛇山,南面长湖、紫阳湖,东邻抱冰堂,西接阅马厂,经一段建设,该处“红砖厚瓦,当时称为气象轩昂之黉舍”^③。方言学堂教授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以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学科,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的。学生额150名,每国文字30名。学生年龄15岁至20岁。先以自强学堂学生,择其品端文优者入学。后又以普通中学毕业生升入。学制五年,前两年以华人为教习,后三年聘洋人为教习,以湖北试用知府程颂万为提调。

湖北方言学堂系湖北自强学堂的变名,此为张之洞所确认。张氏光绪三十三年(1907)《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教员折》曰:

至方言学堂,先名自强学堂,开办最早,后经迁移,始定今名。

惟方言学堂原名自强学堂,开办远在定章之前。

此处“定章”指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办远在定章之前”,指光绪十九年(1893)创办自强学堂,在《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前10年。

曾任武昌师大校长的张继煦在所著《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也明确指出:

方言学堂就自强学堂改设……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宗旨。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6年。

②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明治31年公文备考 舰船》2卷。

③程发轫:《武高麟爪》,载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28期,1970年10月1日。程氏为武昌高师首届学生,他描写的是1913年所见之武昌高师,然其校舍一仍方言学堂旧观。

从朝廷定位及学制、教员、学生来源观之，自强学堂一方言学堂是“高等学堂”，前者略具多科高校雏形，后者近似今之外国语学校。两学堂有着清晰的前后承袭关系。

自强学堂一方言学堂的实绩，从早年入两湖书院，后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陆军正参领卢静远(1874—1945)于宣统二年底(1911年1月)的奏折可略见大貌：

前大学士张之洞督鄂时于光绪二十二年在武昌省城创兴自强学堂，立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东文五斋，令在堂诸生人习一文，并译以格致、算学等科，……于光绪二十八年会同前湖北巡抚端方奏请改办，定名曰湖北方言学堂，前后十余年间考取毕业能致用者颇不乏人，如京师大学堂开办伊始，所有译员半取资于鄂省。近年以来充当学堂教员及办理交涉之译员，尤为各省所争聘。^①

自强学堂一方言学堂毕业生在湖北省学、政诸界任职者甚多，卢静远奏折则从全国范围明示自强学堂一方言学堂在清末外语、外交人才培养方面的卓异贡献。

五、方言学堂 1911 年春停办，1913 年于方言学堂校址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由于经费困窘，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与湖北提学使高凌霄向湖北咨议局提出停办方言学堂议案，咨议局予以抵制，议决“方言学堂应不停办”^②。

瑞澂等于宣统二年十一月再度提出停办方言学堂议案。陆军正参领卢静远于同年十二月廿六日上奏，称“湖北方言学堂未便轻议停办”^③。

可见，围绕方言学堂是否停办，从湖北地方到朝廷颇有争论。然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提学使王寿彭遵湖广总督指令，断然将方言学堂停办。但即使此时，湖北咨议局仍以方言学堂“暂停招生”之说与“停办”相抗衡。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约于1912年初，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方言学堂旧址建武昌军官学校，校长马氏。

民国二年(1913)二月，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将全国分为六大学处，每学处建一高等师范，武昌学处(包括湖北、湖南、贵州等省)拟于武昌开设高师。据教育部《高等师范分区草案》所载“分设各该地点之理由”，略为：

- (甲)设校地点就交通较便之处
- (乙)有旧建校舍可用以节省开办经费
- (丙)其就近分属之省所设中等学校生徒堪资升学^④

1913年春，教育部派员到武昌考察多所学堂，认为原方言学堂较具条件。故全国其它学处多以优级师范为基础建立高师，惟武昌学处以湖北方言学堂为基础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四部，为民初全国六大高等师范之一。

武昌高师及后续之武昌师范大学一直将办学渊源追溯至方言学堂。1924年刊印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同学录》载《大事记略》，开篇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高等师范事宜旋即委充校长拨武昌旧方言学堂迤西房屋一栋为筹备处。

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本校校址。

武昌高师—武昌师范大学承袭湖北方言学堂校址无疑。

《大事记略》还称，民国三年(1914)武昌高师成立各种学会，第一个便是“三月设英语学会”，四月设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陆军正参领卢静远湖北方言学堂未便轻议停办由》(宣统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②见《湖北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案》上卷。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陆军正参领卢静远湖北方言学堂未便轻议停办由》(宣统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④中华民国教育部：《高等师范分区草案》，1913年6月。

数学研究会(后改称理学会),民国五年设史地研究会。

又据老辈武大人回忆,方言学堂图书及部分教员转入武昌高师。笔者尚未找到方言学堂图书转入高师的直接证据(在政权更迭、战争频仍之际,当时不大可能签留图籍转交文件),然“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三校递变期仅两年(1911—1913年),方言学堂图籍保存并转入高师的可能性很大。以笔者三十余年作辛亥武昌首义史研究所知,辛亥首义后,革命军纪律严明,武昌城内未现乱局,除开始几天发生杀戮满人(很快受到制止)之外,武昌极少出现抢掠、焚毁财物(尤其是藏书)的现象,故原方言学堂图书应获保存,而一个建校近20年(从自强学堂算起)的学堂藏书当数不在少,成为武昌高师图书基础在情理之中。民国三十六年(1947)印行的《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届毕业纪念刊》所载《校刊》,在论及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承袭关系时称:

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引者)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少宏远矣。

称武昌高师承袭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然规模稍扩大一些。此当为可信之论。

六、武汉大学校史起始三说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以前的诸“前身”的名称、性质多有变迁,关于武汉大学校史起始何时,因标准的宽窄尺度掌握有别,向有不同推定。1963年,李达校长主持校史论证,当时即有三说:

(一)1928年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民国时期的校史持此说。

(二)1913年说(国立武昌高师成立)。

(三)1893年说(自强学堂成立)。

应当指出的是,在持“1928年说”的20世纪30年代初,武汉大学已把学校渊源追溯到方言学堂。民国廿一年(1932)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五年(1936)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陈述学校“沿革概要”,皆从方言学堂起讲,其文字表述与1924年刊印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同学录》载《大事记略》基本相同。此种把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渊源追溯到方言学堂,是从武昌高师至武汉大学的一种传统。台湾武汉大学校友会也秉持此一传统。

1968年,台湾武汉大学校友会编《珞珈》第23期载《国立武汉大学的简史》开篇称:

本大学以民国十七年九月肇建于武昌城内之东厂口。初,清季湖广总督张文襄公香涛,创设方言学堂于此,以讲习西学。^①

1970年,《珞珈》第25期载《五十八年校庆纪实》,记老校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程发轫的谈话,《纪实》称:

程学长是民二入武昌高师(武大前身),民六毕业,他真是“元老”校友了。他说明了武汉大学的渊源来自,从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香涛)在湖北办学,十九年设立“自强学堂”,以后改为“方言学堂”,后再改为武昌高等师范,然后又到了珞珈山(武汉大学)。所以,武汉大学是历史很悠久,根基最深厚的一个学府,武大是在“扩展”又“扩展”的情形下,逐渐成长壮大的。^②

《珞珈》同期还刊《国立武汉大学的起源》,引《皇朝蓄艾文编》卷十六,详述自强学堂兴办始末,以作为“校史资料片断”。^③

1972年,《珞珈》刊载《国立武汉大学大事记》,首列“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于武昌城内东厂口”。^④

1981年台湾武汉大学校友会编《学府纪闻 国立武汉大学》所载国立武汉大学《校名之演变与大事记略》,亦将武大校史源头追溯到“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于武昌城内东厂口,训练外国语文人才。”^⑤

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负责人更多次宣示方言学堂为武汉大学“前身”。

①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23期,1968年7月1日。

②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25期,1970年1月1日。

③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25期,1972年1月1日。

④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34期,1970年4月1日。

⑤《学府纪闻》,(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国立武汉大学代校长、经济学家刘秉麟(1891—1956)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2日举行的“国立武汉大学三十五年度新生训练周”的讲话中说：

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①

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法学家王世杰(1891—1981，号雪艇)1978年在台湾寓所回答访问时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前身，你们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学堂，而武昌高师，而师范大学，而武昌大学。然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原来在武昌城内阅马场旁的东厂口。^②

可见，在持1928年说的国立武汉大学主事人那里，也是把校史沿革追溯至方言学堂的。

七、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历次更迁，1928年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

承袭清末近代教育学脉，民国二年(1913)在湖北方言学堂旧址设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底，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及私立文华大学等校，共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六科。

1928年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设文、理、工、法四科。

1932年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迁入武昌珞珈山新校舍。

1938年迁四川乐山。

1946年返回武昌珞珈山，设文、法、理、工、农、医六学院。

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

回顾武汉大学校史，诚谓“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武汉大学校训之首语“自强”，从自强学堂校名引出。程颂万(1865—1932，程千帆教授的叔祖父，号十发)于己亥年(1899)接任自强学堂提调一职，曾“大课自强学堂诸生”，师生作文应之，后“己亥年终大课目录”等编辑成集，题名《强学编》，程氏作《强学编小引》，开宗明义云：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曰：“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又曰：“知困然后能自强。”

盖必沉潜义理，以治心身，然后可以蕲其用于家国。南皮公设学，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也，学者宜知所做焉。^③

程氏深获张公设学兴教之旨——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而当求“自强”。我辈应发扬此一精义，日进不已。

● 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 tyfeng@whu.edu.cn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见《武汉日报》1946年12月4日。

② 殷正慈：《记王雪艇先生谈珞珈建校》，载《学府纪闻》，(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③ 《十发盒丛书类稿》第六《教育二》。